

# 后现代身体的分裂与聚合

## ——基于政治仪式中身体规训技术的分析

王海洲\*

〔摘要〕 后现代情境中身体的分裂趋向,直接阻碍了个体迈向政治共识的道路,间接威胁到政治权力系统的稳定和民族国家政治文化的持存。政治仪式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行为系统,借助连续性身体规训技术和稳定性社会规训技术,一方面,发挥传统的政治功能,由外而内地对分裂的身体施加一种强制性的聚合力;另一方面,为适应后现代社会而积极转变,通过唤起个体公民对其身份中蕴涵着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责任的重视,由内而外地产生出一种主动性的聚合力。

〔关键词〕 政治仪式;身体规训技术;强制性聚合;主动性聚合

在后现代社会中,“生活在碎片之中”<sup>①</sup>的个人境况所带来的威胁愈演愈烈,我们确有成为“堕落的公共人”<sup>②</sup>之虞。贝尔(Daniel Bell)认为,这种情状的缓解有赖于我们的“文化能否重新获得一种聚合力,一种有维系力、有经验的聚合力,而不是徒具形式的聚合力”<sup>③</sup>。“解铃还须系铃人”,传统和现代不仅提供了培育后现代的沃土,或许还隐藏着一些解救后现代的良方——本文着力探讨的政治仪式便是一剂值得重视的医治“良药”,它作为一种历史悠远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传统社会的无用子遗,而是在历久弥新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后现代社会中,个体危机集中在身体问题上。不同于传统社会将身体完整地放置在等级秩序中,也不同于现代社会扶持身体庄重而独立的姿态,后现代社会漠视身体的从属问题和权利问题,或沉湎于率性的“拼凑”(pastiche),或钟情于随意的“漫游”(peregrination)。在面对这种身体状态时,政治仪式对身体能够借助于两种不同的规训技术,既提供一种强制性的聚合力,从外部阻止身体的分裂,这是政治仪式最为基本的传统功能之一;也提供一种主动性的聚合力,让个体通过由内而外的反思给予自身一种有效的护持,而这正是政治仪式在新的社会情境下需要作出的重大转型。

---

\* 法学博士,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210093。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0YJC810045);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1CZZ035)阶段成果。

①[英]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郁建兴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

②R. Sennett, *The fall of Public M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Vintage Books, 1978.

③[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68页。



## 一、两难的“分裂”:政治身体的后现代转向

现代意义上的政治身体发轫于文艺复兴时期对人本身的重视,启蒙时代将关注点从身体的从属问题转向身体的权利问题,真正锻造出具有独立政治意义的身体。就政治秩序的转变而言,“莫非王臣”的民众在肉体上与君主制告别,开始迈向社会或自我(由此发展出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两条路径)。19世纪晚期尼采(Nietzsche)“升华肉体”<sup>①</sup>的呼声振聋发聩,指出“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只能是身体的历史,历史将它的痕迹纷纷地铭写在身体上”<sup>②</sup>。海德格尔(Heidegger)、德勒兹(Deleuze)和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等人延续尼采的道路,为身体的主动性或独立性作出各自的辩护和阐发,他们的理论成为后现代情境中政治身体研究的滥觞。至此,曾经只是言说工具的身体拥有了专属的话语系统。在政治学视野中,身体不再是政治制度中一个无声的元素,而是有着特殊表意能力的主角,甚至“成为现代政治的中心”<sup>③</sup>。

福柯(Foucault)延续前人的脚步,创建了个体指向的微观权力学和群体指向的生物政治学,开辟出一条后现代的政治分析道路,从碎片式的、多元化的和微观性的身体入手,切中了政治系统的肯綮。他以话语、谱系、身份和身体为经纬,以权力为核心,编织了一张精密而复杂的理论之网,规训便是织网的关键技术。在此视域中,人的肉体被当作可分割的整体,通过空间控制、时间控制、行为控制和力量控制等各种技术被分别处理,诸如“考试”、“检阅”和“阅兵”等活动都可被视作某种规训仪式<sup>④</sup>。在福柯看来,“分割”身体显然不是让身体“破碎”,而是相反,通过作用于身体各部位或身体行为各步骤的微观技术,实现对身体所承载的精神和情感的统一调度。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哈维(Harvey)明确指出:“在福柯关于事物的体系中唯一不可化简的就是人的身体,因为那是一切压制的形式最终都被记住的‘场所’。”<sup>⑤</sup>既然在后现代社会中,身体仍然保持着一种完整性,那么身体的碎片化又是何意?哈维认为个体的现代和后现代状态有所不同:现代社会的个体被设想为“异化”了的,而异化就意味着个体是一致的;在后现代社会,个体不能再被设想为被异化了,而是自我“分裂”了。<sup>⑥</sup>因此,身体的碎片化简单来说是身体意识或自我观念的碎片化。这种分裂有其积极意义,例如能够帮助人们对抗资本的控制,在一个消费文化越发趋同的宏大空间中,“分裂的特质对于社会身份和行动来说就越是重要”<sup>⑦</sup>;或者如奥尼尔(O'Neill)给出的更为确切的意见:有着多重要求的身体能“对抗和反击那些支配我们的非人性因素的力量……能极大地强化公民民主的交往性能力”<sup>⑧</sup>。但是,这种分裂并不总是满足于充当抵抗者,它内在的、无限的“解放”要求往往将自我推送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这会在微观层面上造成一种危险的后果——个体在“信任”问题上不知所措,“不知道该信什么”和“我相信很多东西”都融合在同一种日常体验中。正如鲍曼(Bauman)所言:“后现代生活策略的轴心不是使认同维持不变,而是避免固定的认同。”<sup>⑨</sup>如此一来,后现代社会中身体的分裂是必

①[德]尼采:《苏鲁支语录》,徐梵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6-27页。

②汪民安:《身体、空间和后现代》,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③[美]布莱恩·特纳:《身体问题:社会理论的新近发展》,汪民安,陈永国:《后身体:文化、权力与生命政治》,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3页。

④[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11页。

⑤[美]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5页。

⑥[美]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第75-76页。

⑦[美]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第339页。

⑧[美]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张旭春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1页。

⑨[英]齐格蒙·鲍曼:《后现代性及其缺憾》,邹建立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105页。



然的,也是吊诡的,无数碎片式的身体一方面在反对现代性物质力量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中扮演着平民英雄的角色,另一方面又让整个人类社会的“精神分裂症”越发严重。

如何在政治仪式中理解后现代身体的这种两难状况?象征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切入点。一方面,如人类学家道格拉斯(Douglas)所指出:“除非把身体看作一种社会的象征,[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仪式。”<sup>①</sup>另一方面,在政治学视域中,身体被视作一种“权力的记号”<sup>②</sup>。我们认为,身体在政治仪式中承载着一种象征性的权力,通过仪式操演被转换成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权力。于是,身体的碎片化就突出表现为身体所具有的象征意义的碎片化。这些碎片之间存在着以“无主化”和“去责化”为特征的彼此龃龉和割裂的关系——传统政治仪式中的那种言行一致、身行合一的身体已经非常罕见,取而代之的是后现代社会中常见的充满口是心非、身行悖谬的身体。这就是后现代社会中,政治仪式所面对的身体境况。

在后现代社会中,虽然身体分裂后的各部分,如肢体语言、服饰、头发和纹身等都可能不同政治意识的象征,或者整体性的身体成为政治社会中的一个缺乏稳定立场和明确态度的碎片,但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仍需以一种统合性的意义上理解碎片化的身体和身体的碎片化。政治仪式本身是一套独立完整的表意系统,而担负操演职责的身体在表意的方式和向度上不会与政治仪式的根本意图背道而驰,如果出现了反常现象,可能意味着仪式的本来面目经受着巨大的挑战,甚或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sup>③</sup> 政治仪式显然不能接受这种挑战和颠覆,它凭借有效的规训技术旨在达到两个基本目标:一是塑造“听话的”身体以“说出”明确的意思,二是将单个身体中所潜藏着的力量剥离、收集并转移出来。这两个目标的最佳效果是,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阻止政治共同体的分裂,在后现代社会中阻止公民个体的分裂。在不同社会中,阻止的方式完全相反。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采用强制性的外在力量迫使个体聚合在一个共同体范畴内,而后现代社会依靠个体的内在力量主动地维系自身的完整。

## 二、强制性聚合:两种身体规训技术的传统维度

无论在何种形态的社会中,政治仪式都要依靠两种最为基本的规训技术处理身体,一种是通过控制身体位置和行动次序的连续性规训技术,另一种是维系身体和身份同质化的稳定性规训技术。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身体规训技术的最终效果有着明显的区别。我们先讨论两种身体规训技术的具体内容和它们在传统维度(相对于后现代而言)中的主要任务。

连续性规训技术由两种具体的策略构成,一是对身体在政治仪式中所处的位置进行限定,从而保证作为权力符号的身体符合政治仪式这种权力话语系统的目的;二是确定身体在仪式操演中的行动次序,保证权力信息的流通和交换不受阻滞,这正是权力生产的动态过程。在周而复始的操演中,政治仪式将一种与日常生活相隔离的独立行为系统的自足和完善表达出来,它具有相对完整的意义体系,甚至这种意义体系在经年累月的连续操演中具有了不证自明性,从而能够为流淌于其中的权力赢得神圣权威的合法性支持。

身体位置在政治仪式中的呈现,可以通过时间和空间组成的网格来计算。以阅兵仪式为例,士兵在阅兵前的训练中对身体及其行为进行苛刻的分解,令举手投足在每一个时空网格中都达到极高

①[英]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黄剑波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143页。

②[美]布莱恩·特纳:《身体问题:社会理论的新近发展》,第27-28页。

③[美]玛莉·伊莱恩·赫戈兰德:《伊朗的仪式与革命》,《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的准确性。但是在仪式过程中,身体及其行为的分解变得微不足道,甚至被刻意掩盖,因为姿态上的一致性、行动在时间上的分秒不差以及在空间上的毫厘不爽才是表演、观看和检阅的重点。<sup>①</sup>从符号信息的角度来评估位置感,有关身体位置的仪式规范是要保证身体中的权力信息既完整又准确,任何分割或断裂都会令权力在流动中发生能量的损耗和信息的缺失。仅有位置感还不能保证权力流动的高效和顺畅,更为重要的是观察身体的“处境”<sup>②</sup>。在政治仪式内部,可将处境视作一种以身体为重要节点展开交流和沟通的网络结构,其形塑主要依赖身体的连续性仪式行为。对其中显现出来的身体的行动次序而言,主要的观察点是身体在仪式操演中所运用动作的连贯性和协调性。连贯性意味着身体能够主动获得位置感,在权力网络的变动中保持正确的(也就是规训机制所指定的)向度;协调性要求身体能够适应来自于处境的不同要求和压力,既包括身体对行动的“调和”,又包括身体在行动中的“调适”。政治仪式对身体位置及其行动次序所提出的诸多制约,目的是使权力的承载者按事先发放的入场券对号登台,然后在设定好的线路上循序渐进。要实现这种宏大场景的准确再现,不能仅仅依靠仪式在内容上的规定,还需要位置和次序的普遍参照物和一般等价物的襄助。在此,普遍参照物是一种投射了自我认知在内的“他者的身体”。对普遍参照物的凝视是对个体身体的多点定位,为个体提供了受群体一致性约束和吸引的机制,令政治仪式将规训对象从个体层面提升到群体层面。如果普遍参照物是普遍性的身体,那么一般等价物就是标准性的身体。政治仪式通过塑造一种“标准人”,令不同位置和处境中的身体与之进行权力交换。政治仪式对“标准人”的控制如同国家控制货币的购买力一样,通过各种标准身体的展示来管理权力的汇兑率。标准人虽然是一种仪式人,但已将仪式标准扩展至仪式之外、社会之中。如古今中外常见的阅兵仪式、对各类模范人物和机构的嘉奖仪式以及关于伟大历史人物或政治英雄的纪念仪式等皆属此类。它们的规训机制极大地扩展了政治仪式规训对象的规模,形成了一种社会规训。

连续性身体规训技术令权力通过身体及其行动不断地得到生产和再生产,身体成为提供动力的装置。稳定性身体规训技术则促使参与者的物理性身体与其仪式身份保持高度一致,以保证身体作为媒介传输权力时不会遗失附着在特定身份上的权力信息。这一技术主要获得的是基于有效性(绩效)的合法性资源,它最为简单的要求是,参与者的身体要与其仪式身份同质化。

现代社会的政治仪式中广泛存在着对同质化的要求,并且在权力欲望的推波助澜下上升为规训机制,其最终目标不再是身体,而是各种形式的权力。以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为例,围绕总统的物理性身体,从饰品到服装、从姿容到仪态无一不是按照符合总统身份的标准悉心打造的。在仪式之中,新总统的肉体被身份彻底同化了,如果不能和身份契合,那么他们的肉体将是对身份的质疑甚至颠覆——仪容不整、魅力不足的身体对应的是缺乏资格的总统,相反,雄姿英发、踌躇满志的形象则是总统获得认同的关键。在这种同质化规训中,一次次总统就职典礼更是将身体和身份的对应性发挥到更高的程度:对个人而言,关系到总统权力的合法性;对国家而言,关系到的则是国家的形象和地位。一旦被升格到这种程度,总统的身体一方面因兹事体大而不敢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又因这种关联的存在而“力大无穷”。身体和身份同质化的规训机制主要有两种实现路径,一是令身体向身份靠拢,二是制造无差别的身份以实现身体的匀质性。在政治仪式中这种规训机制的有效性是在双重保障下取得的。首先,同质化能够带来政治收益(也包括其他类型的收益),身体的主人可以获得随身份而来的权力配给。其次,身体和身份的异质化会受到惩罚。在政治仪式中,身体如果做出与其政治身份不符的举动就会受到各种形式的惩罚,包括丧失权力的合法性、退出仪式身份共同体或者仪

<sup>①</sup>王海洲:《政治仪式中的权力宣展与合法性建构——中国社会变革与政治发展中的国庆大阅兵(1949—2009)》,《学海》2010年第4期。

<sup>②</sup>[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7—138页。



式失效等。规训机制越强有力,在惩罚力度上也就越大,既可能是想象的报复,如切断其国族身份供应;也可能是实质性的惩处,如肉体的伤害或财物的处罚。

在后现代情境之外,政治仪式的两种身体规训技术都明显具有一种霸权意味,依靠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系统对身体的位置、行为和身份作出不容置辩的规定。它们的主要作用对象并不是个体化的身体,而是群体化的身体——或者是个体还没有觉察到自身与自由之间的内在关联(前现代社会),或者是个体的自由的一种幻象,根本无法产生足够的力量和手段与社会性的规训展开对抗(现代社会)。连续性规训技术和稳定性规训技术虽然有效地将众多身体聚合在一起,但它实质上阻止的是社会的分裂,其意图一旦置放到后现代社会中,就会出现“风马牛不相及”式的差错,因为这一情境中发生分裂的不是社会,而是个体。

### 三、主动性聚合:“可疑的人”与规训意蕴的转变

连续性身体规训技术和稳定性身体规训技术是政治仪式规约参与者言行举止的基本方式。这种规约限定的并不仅仅是人之肉身,更为重要的是锚定肉身作为权力符号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如果在国家层面的政治生活中来观察这种身体规训技术,不难发现“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个管理身体的政府”<sup>①</sup>。无论是管理者的身体还是被管理者的身体,在政治仪式中都是以政治象征或权力象征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们分别作为实施者和接受者共同确保规训机制的完整性。不可忽略的是,两者在各安其位的同时兼具自我规训的意识,因此都属于能够体现政治社会权力原则的政治身体,只是作用方式有所不同。按照规训概念所携的二元观来看,桑内特(Sennett)站在规训者一端认为,政治身体是“统治阶级对身体的意象……表达出对社会秩序的需要”<sup>②</sup>;戈夫曼(Goffman)则站在被规训者一端认为,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身体可以通过“互动仪式”“生产和再生产一种[他们自己的]道德秩序”<sup>③</sup>。不管何者的身体,在政治仪式中都充当着社会秩序的生理性载体和规范性载体。

规训的含义并没有停止于此,因为规训所存在的具体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福柯在初创“规训”概念时运用了有着后现代风格的研究方法,但其研究背景仍然是现代式的——规训只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肉体伤害的新型监视和禁锢模式,它的作用对象是一群“不正常的人”或者说可能成为不正常的人的人。不正常的人存在于传统社会中,受到的是歧视性对待,甚至是斯巴达式的直接肉体消灭;不正常的人也存在于现代社会中,受到的是严格的纪律约束(福柯所言的规训)或者是一种原则性的包容(罗尔斯所言的正义)。但是,后现代社会中不正常的人的形象是极为模糊的。因为一方面现代性的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的评判标准的规模剧烈膨胀到一个令人无所适从的地步(出现了有数百个模棱两可问题的心理测评表),另一方面,在光怪陆离成为常态的世界中,对不正常的人往往见怪不怪。

那么在后现代社会中,谁需要规训呢?我们的答案是:“可疑的人”。后现代人是一群可疑的人,我们既是被怀疑的人,也是怀疑他人的人。虽然信息高速公路让我们的外在生存空间从曾经的泱泱天下变成了狭小而拥挤的“地球村”,但人的内在精神空间则被推送到一个充满了可能性的境地中。对于作为政治人的“公民”来说,其政治身份曾是现代社会之于传统社会臣民身份的巨大进步,也是

①[美]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马海良等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47页。

②[美]理查德·桑内特:《肉体与石头》,黄煜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③S. C. Bolton, “Me, Morphine, and Humanity: Experiencing the Emotional Community on Ward 8”, in S. Fineman(ed.), *The Emotional Organization: Passions and Power*,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8, p. 18.



现代社会中参与政治生活最为基础和必要的条件,但是在后现代社会中,可疑的人的公民身份受到了种种质疑。

时代不可逆转,但可疑的政治身份是可以重获信任的——当然,这个前提是后现代社会中的政治人仍然是公民,并且彼此信任对后现代社会来说是有益的,我们的分析正基于这种预设作出。虽然“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概念和经验都是现代性的,但它也适应了时代的发展,用斯廷博根(Steenbergen)的话来说:“公民身份的历史可以描述为一种包容性不断增强的历史。”<sup>①</sup>在后现代社会中,与身体碎片化趋势并辔的是公民身份多元化趋势,它虽然广泛认同不同政治架构(包括共同体层面和文化层面等)间的包容,但多元化中还有着“无元化”和分散化的含义。其结果是,个体公民具有多重政治身份,其政治立场能够频繁变幻。公民身份的多元化表明公民对政治生活的认知、理解和介入产生了种种分歧,由此造成的冲突或融合都可能聚集在个体之中。而政治仪式中的个体基于多元政治观的不同判断会对政治仪式产生反作用力,其力度和方向取决于个体在多元身份中的抉择。公民身份的多元化意味着个体成为权力信息的多元存储器,虽然便于个体及时应对政治仪式及其外部环境的种种变化,但在其自发变化中也存在着很多危险,如重要的仪式角色随意变换自己的身份而引发的仪式危机。在传统政治仪式中难得一见的、具有致命性作用的反戈一击,在后现代社会的政治仪式中并不罕见,这证明传统社会中能够解决社会冲突和缓解社会紧张的政治仪式,在后现代社会中很可能导致冲突的扩大和紧张的加剧,甚至它们本身就是冲突和紧张的原动力。

公民身份的分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不同政治空间的文化断裂,但也带来了重组的可能性。与此相应的是,政治仪式在艰难地维系自身传统的同时,也在某些时空中发生了程度不等的松动,以勉力为碎片化的政治个体提供一种新的聚合途径。消极公民和积极公民的身份界分为观察这种松动提供了新思路。消极公民把大多数人看作是消费者,而政治仪式能够为其提供某种抒发情感的舞台,其搭建理由是扩大文化自主政策、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公民自由的仪式性呈现以及直接服务于地方的经济发展等等。一些政治仪式之政治意味的衰弱或多或少地与仪式组织者或主持者属于消极公民有关。在这些仪式中,个体介入社会的主动性大幅增强,并在一种缺乏霸权强压的环境中得到了相对自由的舒展。积极公民与之相反,他们将少数人看作所谓的成功人士,是政治架构的主要维系者。政治仪式保护政治结构的功能性意义就显得格外重要,授权仪式、检阅仪式或者重大国家节日的庆祝仪式成为巩固政治结构的重要实践。在这些仪式中,个体基于外因的诱导而激起内在的政治情感,主动地对自我和外界产生聚合性的认同。如果说消极公民受到了个人享有充分政治权利的激励,那么积极公民则勇于担当政治责任。对于政治仪式而言,无论基于消极公民的考量还是基于积极公民的考量,出现了两条不同的聚合路径。在消极路径上,个体通过聚合成整体性的社会群落而修复分裂的身体;在积极路径上,个体则通过聚合成民族国家的共同成员而克制政治身份的碎片化。

后现代公民的政治身份往往徘徊在“非此即彼”和“什么都行”之间,政治身份概念中包含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责任很容易弥散在其中。政治权利和政治责任无疑是庄重的,后现代政治系统中的种种行为不能耽于完全忽视规范的“随机”状态,一个后现代政治人“并非怎样都行”<sup>②</sup>,这便是政治仪式在后现代社会中仍然有必要存在的重要原因。波兹曼(Postman)在1980年代对电视社会的来临和盛行给出了一个评价:“娱乐至死。”<sup>③</sup>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发人深省。他认为电子文化的确带来了

①[英]巴特·范·斯廷博根编:《公民身份的条件》,郭台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164页。

②[南非]保罗·西利亚斯:《复杂性而后现代主义——理解复杂系统》,曾国屏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前言第4页。

③[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章艳、吴燕荃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许多便捷,但它缺少了印刷时代的严肃思考和负责态度,人类在电视机面前越发无聊和肤浅,人们距离能够增强共同情感的仪式越远,就距离那种既自以为是又率性盲从的生活越近。时至今日,迅猛发展的网络信息技术所带来的种种忧患正是这种观点的有力佐证。我们相信,虽然公民的形象和职责在变化,但“创造一种理性的社会秩序是公民身份演变的一个重要基础”<sup>①</sup>。庄重的政治仪式或许可以提醒个体公民重视自己的政治身份,并在反思中与社会和国家一起成长——对于一些积极的后现代主义者而言,对真正健康而成熟的个体、社会 and 国家的期盼,才是后现代概念中蕴藏着的最强大的力量。

(责任编辑:杨嵘均)

## **Fission and Fusion of the Postmodern Body: An Analysis of Physical Discipline Techniques in Political Rituals**

WANG Hai-zhou

**Abstract:** In the postmodern context, the tendency of the fission of the postmodern body directly prevents individuals from reaching political consensus and indirectly undermines the stability of the political power system and the existence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nation-states. As a kind of special system of political behavior, the political ritual has two such functions as a continuous physical discipline technique and a stable physical discipline technique. The former function is traditional in that it works externally and forces the split body to combine together; the other is postmodern in the sense that it works internally, enabling the individual citizens to unite together actively by raising their awareness of their innate political rights and duties.

**Key words:** political ritual; physical discipline techniques; compulsory fusion; active fusion

---

<sup>①</sup>[英]巴特·范·斯廷博根编:《公民身份的条件》,第177页。